

石黑一雄《别让我走》中的创伤美学

汪 顺 来

(常州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22)

摘 要:当代著名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非常关注人类的创伤体验和悲剧性命运。《别让我走》是他创作的一部具有科幻色彩的小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作者凭超凡的想象描绘了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克隆人群体,面对生命和责任时表现出的复杂情感。克隆人的生活经历映照出当今人类的生存境况,揭示了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危机感和焦虑感。石黑一雄借助于新奴隶叙事、空白叙事以及“旁观者效应”,细致地剖析克隆人遭受的无形的、无言的和无助的精神创伤,充分展示了一种融创伤、悲壮和审美为一体的创伤美学。

关键词:石黑一雄;《别让我走》;创伤美学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2)03-0094-08

10.19742/j.cnki.50-1164/C.220310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在当代英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与奈保尔和拉什迪一起享有“英国文坛移民三杰”的美誉。《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 2005)是石黑一雄的第六部惊世之作,也是一部具有科幻色彩的小说。小说中,他凭想象构建了一个克隆人被大规模生产的社会,反思科技对文明秩序和道德理性的冲击力。那群克隆人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英格兰,除了与普通人貌似,他们也有理想抱负和思想感情,但却逃避不了被“捐献”器官的厄运,直至在痛苦中终结他们短暂的生命。

石黑一雄创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以委婉的语言巧妙地掩饰克隆人被血腥屠杀的可怕景象,直击克隆人内心深处的创伤,着力表现这些弱势群体面对生命和责任时的无畏、无奈和无助的情境。小说中的黑尔舍姆寄宿学校简直是现代社会的缩影,那里克隆人的生活看似无忧无虑,却时刻处于科技力量的威逼之下。他们受无形的权威控制,失去自由选择的机会,任凭命运的摆布。这样的尴尬处境细思极恐,与现代人的生活状况极其相似。现代科技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但基因工程的推广、核武技术的滥用和机器人的诞生正考验人的良知,科技的强大威力已经威胁人类的存在,技术革命正逐渐蚕食人性的光辉,“人逐渐成为信息和数据符码化的后人类”^{[1]130},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正侵蚀着现代人的心理。在《别让我走》中,石黑一雄紧扣克隆人的精神创伤,凭高超的叙事技巧,如新奴隶叙事和空白叙事,透视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状态“旁观者效应”,充分表现了现代社会语境下一种特殊的美学体验。

一、新奴隶叙事:揭示隐性的伤和孤寂的美

19世纪,白人废奴主义者为了说服白人读者废除奴隶制而出版了奴隶叙事作品,旨在揭示“奴隶制

收稿日期:2021-11-08

作者简介:汪顺来(1970—),男,文学博士,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小说。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空间批评视野中的美国华裔传记文学研究”(2020SJA1267)。

的残暴和美国黑奴逃亡后获得的思想和道德价值”^{[2]131}。奴隶叙事进而成为美国黑人小说美学的传统之一,讲述美国黑奴如何逃离南方种植园,投奔北方自由州后重获新生的经历。传统的奴隶叙事多采用第一人称自传体叙事的形式,控诉奴隶制的危害性,旨在引发白人废奴主义者的同情。道格拉斯(Fredrick Douglass, 1817—1895)的三部自传《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奴隶的叙述》(1840)、《我的奴隶生涯和我的自由》(1855)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时代》(1881)就是典型的奴隶叙事文本,详细回顾了自己从奴隶成长为自由人的历程。道格拉斯的奴隶叙事大大推动了美国废奴运动的进程,但他的缺陷在于虽然他强烈抨击了奴隶制的邪恶,却回避了白人优越论和种族歧视对黑奴的心理伤害。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2019)修正了前辈黑人作家奴隶叙事的传统,创作新奴隶叙事文本;她借用奴隶叙事的内容和主题,但在语言艺术和政治目的上则完全不同,目的是“更准确地揭示奴隶制的可怕及其遗毒的真相”^{[3]38}。她的小说《宠儿》(*Beloved*, 1987)就是一部新奴隶叙事的杰作,叙述了美国黑人无意识深处的创伤记忆。

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与莫里森的《宠儿》形成互文效应,叙述现代文明社会体制下一群生物技术的奴隶——克隆人的创伤记忆。莫里森的《宠儿》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以“再记忆”(Re-memory)的形式探讨非裔美国人心中无法消除的“痛”——美国奴隶制的可怕后果;而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基于科幻般的想象虚构了现代文明制度下一个无形的、沉默的被奴役阶层——克隆人的生活场景,展现了生物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创伤。威多森(Peter Widdowson)认为:“我们也可能要问,小说家是否在运用虚构作为历史来探索过去的伤痕如何对现在的渗透……”^{[4]492}威多森通过论述历史小说中真实与虚幻、历史与叙事的关系,探讨小说家的创作伦理。《别让我走》中,石黑一雄以科幻的手段构建未来怪诞的世界,表现他理性的创作伦理:他不愿看到历史上奴隶制那可怖一幕的再演,警示人们要时刻提防现代科技奴隶制的幽灵再现。

《宠儿》以非裔美国人的视角审视奴隶叙事对母性和自由的传统表达,探讨了母爱的力量和自由的真正含义,而《别让我走》以克隆人的视角审视奴隶叙事对人性和伦理的传统表征,探讨了科技社会下人性的缺失和伦理的失衡。莫里森颠覆了传统奴隶叙事的主题,重塑黑人母亲的正面形象并反思奴隶制废除后美国黑人的自由悖论;石黑一雄将莫里森的新奴隶叙事进一步推进,审视科技发达和高度文明的社会里存在新奴隶制的可能性,引发人们对人性和伦理的再思考。

石黑一雄模仿传统奴隶叙事的手法,以一个克隆人名叫凯茜·H的自传体叙事形式为挣扎在文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发声。小说的主要场景位于20世纪90年代末英格兰的一个貌似普通但有几分神秘感的寄宿学校黑尔舍姆(Hailsham),它在外观和运作方式上与其他寄宿学校没什么两样,校舍、图书馆、体育馆、运动场、医院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还有交易会或拍卖会等业余文化活动。但这所学校的神秘之处在于它的“学生”是一群克隆儿童,他们年龄相仿,家庭来源不详,每个学生的姓氏都是以单一字母标注,他们就好像是工厂按批次生产的产品一样,为便于区分而加注代码。他们每周都有例行体检,对这群克隆儿童来说,课程学习和思想教育被严格管控,身体健康最重要。学校“老师”也很特别,统称为“监护人”(guardians),他们的言行举止更像是现代社会的“正常人”,负责对克隆人的日常课程教学和洗脑教育,监督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学校里的师生关系也耐人寻味,由于老师的身份变成“监护人”,表明师生关系仅是一种法律上的责任,不包含任何情感联系。“监护人”与学生间始终在身体和心理上保持距离,他们看克隆人的眼神如同“害怕蜘蛛一样”,尽管孩子们“从没有想过,被人当成蜘蛛看待”^{[5]32}。黑尔舍姆学校与《宠儿》中的种植园“甜蜜之家”(Sweet Home)有惊人相似的体制。“甜蜜之家”的奴隶主叫“学校老师”(Schoolteacher),他将奴隶们禁锢在种植园内,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在他的眼里,奴隶就是牲口,“是没有牙的看门狗,没有角的公牛,是阉割的辕马”^{[6]160}。“甜蜜之家”对奴

隶来说,只是一个美好的名字,不是他们的家园。同样,黑尔舍姆学校对克隆人来说,也徒有学校其名,不是他们心中的象牙塔。克隆人与奴隶有着同等的境遇,都是奴隶制下痛苦呻吟的被压迫群体。

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1975)中发展了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理论,将监视和规训化作一种无形的凝视力量,并内化为成员的行为规范:“整个社会机制已经被无个性的凝视改造成一个具有感知能力的场所:到处都有千万只眼睛,在警觉地监视着……”^{[7]214} 福柯形象地阐释了视线规训的强大功能,每位成员都处于被监控中。黑尔舍姆学校在地理位置上更像一个“圆形监狱”:“黑尔舍姆位于一个四周都是高地的平整山谷中。这就意味着从主楼的几乎每个教室的窗口,甚至是体育馆往外看,你都能有一个开阔的视野,可以清楚地看到又长又窄的道路穿过田野,一直通到大门口。”^{[5]31} 学校里的克隆人就像监狱里的囚犯一样,无法越大门一步。然而奇怪的是学校并没有摆设任何现代化的监控工具,它既没有高墙电网、瞭望塔、电子探头等,也没有卫兵看守。克隆人或许已经将外在的监控力量内化在骨子里了,早已丧失了逃跑的勇气,甘愿沦为被命运宰割的奴隶。黑尔舍姆的规训是多层面的,其中视域规训让克隆人永远处于被蒙蔽状态。虽然故事发生的时间是20世纪90年代末,但学校里的克隆人与外界联系是绝缘的。他们没有电话和其他通讯设备,没有电脑和网络;偶尔的娱乐也只是看看录像带、听听磁带等。语言规训已被学校制度化,连谎言也成为规训的工具,将“顺从”不带任何条件地注入克隆人的心里。抽烟、恋爱、做爱和生育都是克隆人日常禁忌的话题,而“延迟捐献”的谎言如神话般的美好维系着克隆人的生存希望,因为他们天真地相信:艺术揭示灵魂,灵魂反映真爱,真爱可延迟捐献。黑尔舍姆寄宿学校如同一个规训无处不在的封闭世界,“学生”被无形的力量监控着,像一群生物技术的奴隶。

奴隶制是人类历史的污点,它是一种泯灭人性的制度。奴隶制不仅摧残奴隶的身体,还毒害他们的心灵,给奴隶带来无止境的精神创伤。精神创伤是无形的,只要奴隶制的阴影还存在。《宠儿》是莫里森以历史记忆的形式对美国奴隶制的控诉。女黑奴塞丝(Sethe)为避免将自己的女儿“捐献”给奴隶主,宁愿为她们选择死亡。为此,她受尽了精神折磨,直至疯狂的边缘,最后在黑人社区的带领下终于走出奴隶制的阴影。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以科幻的形式探究科技奴隶制对克隆人造成的身体和精神的创伤,是对奴隶制历史的追忆和延展。“捐献”是克隆人一个沉重的话题,是他们无法承受的痛。传统奴隶制下,奴隶是奴隶主占有的活物件,他们得无偿地向奴隶主“捐献”自己的劳动、身体甚至子女。然而,现代生物科技会发明一种新奴隶制,将克隆人对器官“捐献”的恐惧不断淡化,试图抹平创伤,让其消失于无形之中。据凯茜回忆说:“早在我们六七岁的时候,就知道捐献这回事儿。很奇怪,当我们长大了,监护人对我们说那些事的时候,没有一件事会让我们感觉完全意外而惊讶不已。”^{[5]75} 监护人一直小心地以“被告知又没有被告知”(told and not told)的方式向克隆人灌输“捐献”“性”“性爱”等话题,以致于后来克隆人将这些话题当成玩笑,渐渐地忽略了器官捐献的严重性。

新奴隶制下,创伤还被奴隶主美化和神圣化,已达到愚弄奴隶、抚慰他们创伤的目的,尽最大努力化创伤于无形。《别让我走》中始终没有出现真正的奴隶主形象,而代之以“监护人”的角色。“监护人不是保护者,而是看守”^{[8]388},是残害克隆人的帮凶,也是奴化教育的实践者。为了从灵魂深处瓦解克隆人的意志,监护人将艺术作为自我审美的手段,证明克隆人缺乏创造性,不能成为“正常人”,为器官捐献披上合理的外衣。小说中“夫人的画廊”集中展示了克隆人的画作,是监护人进行的一次人道主义实验,借机窥伺克隆人的灵魂,并编造了“灵魂若揭示真爱,可延迟捐献”的谎言。实际上,“展示艺术是器官捐献过程的前奏”^{[9]794},是监护人麻痹“学生”的手段,让他们逐渐习惯将“内在自我”献给如奴隶主般的权威人物而使用的伎俩而已。

石黑一雄的“新奴隶叙事”是现代社会体制下依然存在的掠夺和不平等现象的隐喻,揭示了一个沉默的奴役阶层所经受的无形的创伤。《别让我走》中奴隶主/权威人物和奴隶/克隆人都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也是隐性的,甚至被冠以慈善的、主动的行为——“捐献”。生物科技制造的次人类/克隆人承受的无形创伤集中反映了人类进入新世纪后普遍存在的“新千年焦虑”。因此说,《别让我走》是石黑一雄对美国黑人美学思想在科技时代的重构,是表达创伤美学思想的有益尝试。他以科幻隐喻现实、以新奴隶叙事昭示克隆人遭受的无形创伤,更深层次地反映了现代人的心理现实。

二、空白叙事:隐舍无言的痛和凄凉的美

《别让我走》的中心人物是克隆人,隐含的背景是基因工程和相关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小说将传统意义上的寄宿学校故事和现代科幻故事糅合在一起,产生一种亦幻亦真的效果。然而石黑一雄无意揭示克隆技术的奥秘,而意在探讨人类科学活动的意义,洞察科技这把双刃剑给人类造成的精神创伤。

《别让我走》中作者有意采用一些日常词汇,如“看护员”(carer)、“学生”(students)、“捐献”(donation)、“终结”(complete)等,最大程度地削弱文本的科学性内涵,制造模糊性语义,来暗示叙事中的科学语境,将科技的伤害进行陌生化处理,以降低读者对克隆人死亡过程的恐惧。日常生活叙事拉近了文本与读者的距离,并有意回避科技词汇的晦涩难懂。虽然该小说与克隆技术、基因工程有关,但作者始终未提“基因”(gene)一词,因为一旦“基因”被反复提起,人就会被视作“基因文本”,即一个按基因组序列读取的DNA文本,那么人就很容易被视作去人性化的东西。然而细心的读者仍会留意到“基因”在小说中如幽灵般地存在,从而人性不断受到拷问和质疑。空白叙事隐喻地表达了基因技术的过程,却没有给过程的描述留下足够的空间,产生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克隆人器官为什么能被一次又一次地摘除?谁在使用这些器官?摘除器官的成本和效用如何?为什么器官不从原细胞长出?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基因技术有关,但石黑一雄只字不提,他似乎不愿或不忍提及克隆人一言难尽的创伤,而空白叙事在此处起到了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别让我走》从一开始就呈现一种欲说还休、半隐半现的信息释放模式,让读者有点摸不着头脑:“我的名字叫凯茜·H。我现在三十一岁了,当看护员已经十一年多了。我知道,这听起来时间够长的了,但是事实上他们希望我再做八个月,干到今年年底。那样的话就差不多是整整十二年了”^[51]。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叙事,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但她吐露的信息充满着迷思(myth),语气显得很忧伤、迷惘和哀怨。从字里行间,好奇的读者仍能捕捉到叙事者故意遗漏的信息,只不过疑惑重重:为什么凯茜的姓仅保留首字母H?看护员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对她来说11年是足够长的时间?“他们”又是谁?这些疑惑是鼓励读者继续深入阅读的力量,也是读者试图解开凯茜心结的钥匙。石黑一雄在小说的开头设下迷局,逐步展示凯茜的神秘身份和她的人生遭遇,但又故意不和盘托出,将空白叙事的效应发挥到极致。

空白叙事对揭示创伤的危害性后果非常有效,因为创伤的影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如同梦魇一般缠绕着受害者,而且“创伤事件的不同寻常,不是由于它不常发生,而是它会压垮普通人的生活”^{[10]33}。小说中以凯茜为代表的克隆人群体正经历着不同寻常的创伤,他们的身体、身份和人权被肆意地践踏,却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和倾诉的对象。随着凯茜自述的展开,创伤也逐渐明朗:作为看护员,她目睹自己身边的朋友和同学,要么死去,要么濒临死亡;他们的器官被无情地摘除而痛苦不堪,她的安慰却无能为力;她自己也将变成捐献者,可谁又将是她的看护员呢?凯茜将内心的苦痛化作回忆,可是回忆又加剧

了苦痛。她不堪回首往事,所以在叙述中有意省略一些痛苦的细节,如捐献器官的过程,失去朋友和恋人的过程等,表明她对创伤和暴行的本质实在是无法形容,痛苦之情难以言表。

小说的结尾处,作者没有继续凯茜的回忆,而是回到混乱的现实世界,凯茜仿佛突然洞察了所有事实的真相。但是石黑一雄没有描述凯茜的下一步打算,而是将她的未来交给命运,让读者去审视生命的意义,进一步展示空白叙事的魅力。凯茜从痛苦的回忆回到现实,可现实是只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伫立在荒野中,她不忍直视眼前的荒凉景象,创伤的阴影仍然不断浮现:

我微微闭上眼睛,想象这就是我童年起所有丢失的东西,现在都被冲上来了……一个细小的身影就会穿过田野在地平线上出,然后慢慢地变大,直到我看见那就是汤米,他会挥着手,也许还会呼喊……虽然泪水滚过我的脸庞,我并没有哭泣,也没有失去控制。我只是等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到车上,朝不管哪个我该去的地方疾驰而去^{[5]264}。

此时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泪水也无法洗涤伤痕。回忆是过去的伤痕对现在的渗透,但创伤永远会带来抹不去的、说不尽的痛。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借克隆人的境遇隐喻现代人的百般焦虑和无可名状的恐慌,巧妙地省却科技正吞噬人性的细节,将创伤化作难言之隐。对于这些隐秘的创伤,他的空白叙事往往会表达得更多,因为没有说出或不能说的东西才是最深的伤害,这也正是其创伤美学的迷人之处。

三、“旁观者效应”:感受无助的苦和悲壮的美

《别让我走》取自小说中的一首歌名,它是一段痛彻心扉的人生恋曲,表达了克隆人对自己生活着的这个世界的期待和依恋。但这个世界是那么的冷漠,它无情地拒绝了克隆人的哀求。听到那悲伤的歌词:“哦,宝贝,宝贝。别让我走……”,目睹凯茜陶醉于音乐而独自跳舞,连那位神秘的“夫人”也禁不住黯然落泪。她后来回忆说:

我掉泪是因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我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的迅速来临。更科学,更有效,是的。对于以往的疾病有了更多的治疗方式。那非常好,却又是一个非常无情而残忍的世界。我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她紧闭双眼,胸前怀抱着那个仁慈的旧世界,一个她的内心知道无法挽留的世界,而她正抱着这个世界恳求着:别让我走……这让我的心都碎了^{[5]250}。

歌词暗喻了克隆人注定的悲剧命运。世纪之交,新旧世界正面临巨大变革。科技发达的新世界能治疗人类更多的疾病,却无意拯救克隆人的生命,甚至是以牺牲克隆人的生命为代价,因而新世界显得更加无情而残忍;相比之下,旧世界显得珍贵而仁慈,但它也无力挽救克隆人的生命,不得不丢下他们而去,无论他们怎样地哀求。石黑一雄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人情冷漠的世界里,一群无助的克隆人内心深处在苦苦哀鸣的悲惨景象。克隆人的无助和绝望映照了现代人际关系的阴暗面,是对人物心理创伤的一次悲壮性审美。

石黑一雄在小说中还借克隆人的创伤经历,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令人不安的社会现象,即“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指社会成员之间都无视或冷漠地对待他人的痛苦,有意回避事实的真相,从而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甚至怪诞的审美体验。科恩(Stanley Cohen)一针见血地指出:“旁观者与犯罪者无异。他们将起初厌恶的东西逐渐认同为正常的行为,他们回避或最大程度地弱化受害者的痛苦,从而否认亲眼所见的事实。”^{[11]16}科恩明确地将麻木的旁观者等同于施暴者,谴责他们不仅是被动的偷窥者,还是暴行的积极参与者。旁观者的自欺欺人往往掩盖了事实的真相。他们将受害者的痛苦放在一边,甚至视受害者为罪有应得,不值得怜悯和同情,从而加剧了受害者的创伤。

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将旁观者进一步细化,揭示现代社会中形形色色旁观者对自己和受害者他人的木然反应。杨金才认为,这种病态、反常和怪诞的描写反映了个人对社会的“错位感和不适症”,是人物“用一种反常的逻辑表达自己的心声,其中不乏对社会的思考和值得认识的精神价值”^{[12]72}。这种精神价值就在于将“旁观者效应”的触角延伸到人物的内心感受和对人性的反思,并放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把旁观者、证人和受害者置于同一坐标系下逐个审视,探究创伤的美学意义,成为石黑一雄创伤美学思想的又一典型特征。费尔德曼(Allan Feldman)认为:“创伤美学将目击和取证的视觉谱系构建成语,选取证人和受害者来分层观察,而非相互借用痛苦的身体。”^{[13]186} 石黑一雄在《别让我走》中有意模糊证人和受害者的界限,将他们共同视作为旁观者,淡化身体的伤害,直击心理的创伤,让读者感受人生的无助和人性的凄凉,产生一种悲壮性的审美效应。

《别让我走》勾勒出一个冷冰冰的世界,人人都是旁观者,明哲保身成为公认的信条。小说中的黑尔舍姆学校是一个孤独而无半点温情的人类世界的缩影。“监护人”是一群冷漠的旁观者。他们担任多重角色,作为学校老师,他们负责那群特殊“学生”的身体和思想教育;作为监督人,他们严格监管“学生”的一言一行;作为目击证人,他们目睹克隆人的成长和死亡过程,但始终保持漠然置之的态度。监护人尽管扮演多种角色,但本质上都是旁观者。他们以美丽的谎言为诱饵,来检验克隆人的创造力和灵魂,进一步验证克隆人不具人性,为器官捐献披上合法的外衣。整个试验过程中,以“夫人”为代表的监护人总是以冷冷眼神与克隆人保持距离,也许是惧怕,抑或是心虚。监护人偶尔也会出于良心的发现,萌生怜悯之情,如露西小姐点明克隆人捐献的真相,“夫人”为凄婉的歌词落泪等,但她们对克隆人的心理隔阂自然地战胜同情之心,很快退缩到原先的冷漠状态,继续旁观克隆人的命运。

细观小说的情节,读者会隐约感受到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控制着克隆人的命运。他们是权势阶层,最像一群无形的旁观者。这群旁观者从不露面,也不直接插手克隆人事务,却掌控着法律之外的生杀大权和高于道德的审判权。他们为一己私利,轻易摘走克隆人的器官,还堂而皇之地认为取之有道。他们暂时容忍黑尔舍姆学校的存在,可一旦该教育项目呈现人性光明的转机时,就立刻关闭学校,并让它彻底消失,使之成为“一个一厢情愿的谣言”^{[5]237}。石黑一雄没有言明这群无形的旁观者的具体所指,却超越了任何社会语境的限制,严肃地思考了未来科技社会中的人类中心主义问题。人类中心主义者傲视同类中的他者,将道德冷漠强行注入社会机制之中。杨金才指出:“21世纪的人类面对科技的超速发展,如克隆技术、网络技术和太空技术……过于迷恋科技而有自我迷失之虞;日益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14]163} 石黑一雄以无形的旁观者隐喻人类中心主义这个严肃话题,暗示在未来社会中这种“旁观者效应”可能导致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机制,那么人类悲剧性结局会在所难免。

小说中看护员(carer)的角色非常特殊,来自克隆人群体,却又是一群被动的旁观者。他们凭直觉安慰捐献者手术后的苦痛,机械地履行职责,以维持克隆人继续捐献的可能。叙事者凯茜·H是看护员中的典型代表,她目睹自己的好朋友和同学因捐献器官而遭受的痛苦反应,并相继死去,却无力挽救,只是被动地完成权势阶层交代的任务,茫然地活在自己的记忆中。有时,她还为自己的工作成就而自鸣得意:“不管怎样,我做了分内的事,看护各色各样环境中长大的捐献者”^{[5]12}。然而对于所谓的分内之事,她并不了解其性质,并不明白自己从事工作的无意义,因为她无论多么努力,也无法改变捐献者的实际生活。可悲的是作为看护员的凯茜,与其他被动的旁观者一样,无意中参与了施暴者的阴谋,将受害者推向死亡,而自己最终也逃脱不了受害者同样的命运。

小说中的克隆人是人类对自我认识的变形,是科技时代人们对后人类设想的结果。克隆人的闯入使得现实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因为“克隆人放大了正常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和无助,是现实的极端表现”^{[15]97}。克隆人并非作为正常人新鲜血液的补充,而是人类坏死器官的替代品,因而注定其

低人一等的地位和不可救赎的命运。格里芬(Gabriele Griffin)认为:“《别让我走》中,救赎的缺失和克隆人安守命运表明了他们‘天真的旁观者’(innocent bystander)的地位,这种旁观者效应折射出21世纪的人际关系。”^{[16]658}这群天真的旁观者安于现有的生存境况,对命运的不公毫无抗争的行为,他们坦然地面对死亡和旁观同类的悲惨命运。他们既不积极反抗,也不主动逃离,连自杀这种消极的反抗行为也从未提起。克隆人的行为可能会激起有正义感的读者的愤慨,但读者激愤之余又不免对克隆人慨然赴死的勇气油然而生崇敬之情。这也正是小说吸引读者之处,克隆人天真地面对生活、冷静地旁观命运、轻松地拥抱死亡昭示了生命壮美的瞬间,尽管生命消失得太快了,他们还来不及细细地品味生命的价值。

石黑一雄通过塑造不同形态的旁观者,并透视他们对受害者创伤不一致的心理反应,来多视角展现“旁观者效应”在构建自己创伤美学思想中的价值。权势阶层视克隆人的生命如草芥,冷酷无情地剥夺他们的生命权,体现了“旁观者效应”的残暴性。监护人和看护员间接地成了施害者的帮凶,他们情感麻木,甚至有点虚情假意,体现了“旁观者效应”的欺骗性。正是由于这些阴险残忍和自欺欺人的旁观者的迫害,克隆人的创伤显得更加无辜和不幸。克隆人不得不天真地安于现状和平静地等待死亡,这既是对“旁观者效应”的一种无声的回应,又表现出一种殊死的勇气和悲壮的审美。

四、结 语

古罗马修辞学家朗吉弩斯(Cassius Longinus, 213—273)对西方古典主义美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崇高”突出为一个审美范畴。在《论崇高》(*On the Sublime*)中,他将严肃的题材、深刻的思想和崇高的风格三者统一起来,明确了古典主义美学的基本信条。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是西方近代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将美和崇高视作审美判断上的两个对立的范畴。他认为美感在主观上是一种单纯的快感,而崇高感是一种以痛感转化而来的快感。朱光潜认为:“在恐惧与崇敬的对立中,崇敬克服了恐惧,所以崇敬是主要的。”^{[17]371}《别让我走》中,石黑一雄继承西方美学思想的内核,思考了生命、死亡、人性、道德等严肃话题,将创伤、悲壮和审美结合起来,构思现代社会语境下的创伤美学。

石黑一雄运用新奴隶叙事揭示克隆人遭受的无形的创伤,以科幻式的想象重构科技时代下黑人叙事的美学思想。他小说中的空白叙事化创伤为不能说的隐痛,将创伤美学的表达技巧进一步深化。他有意模糊施害者、受害者和旁观者的界限,审视“旁观者效应”在悲剧性审美中的意义。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的情感也会发生一系列的转变,对受害者的遭遇由怜悯、愤怒、恐惧到崇敬,彰显了创伤美学在特殊语境下的深刻内涵。

[参 考 文 献]

- [1] 信慧敏.《千万别丢下我》的后人类书写[J]. 当代外国文学, 2012(4).
- [2] M. D. Kubitschek. Toni Morrison: A Critical Companion[M]. Westport: Greenwood, 1998.
- [3] Jaya Singh. Relevance of Neo-Slave Narrative Technique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ulticultural Literature, 2016(2).
- [4] Peter Widdowson. Writing Back: Contemporary Revisionary Fiction[J]. Textual Practice, 2006(3).
- [5] 石黑一雄. 别让我走[M]. 朱去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6] 托妮·莫里森. 宠儿[M]. 潘岳,雷格,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
- [7]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M].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 [8] Anjali Pandey. ‘Cloning Words’: Euphemism, Neologism and Dysphemism as Literary Devices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J]. *Changing English*, 2011(4).
- [9] Shameem Black. Ishiguro’s Inhuman Aesthetics[J]. *Mfs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009(4).
- [10] Judith Lewis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 [11] Stanley Cohen. *States of Denial: Knowing about Atrocities and Suffering*[M]. London: Polity, 2001.
- [12] 杨金才. 当代英国小说研究的若干命题[J]. *当代外国文学*, 2008(3).
- [13] Allan Feldman. Memory Theatres, Visual Witnessing and the Traumatic-aesthetic[J]. *Biography*, 2004(1).
- [14] 杨金才. 关于 21 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研究的几点认识[J]. *当代外国文学*, 2013(4).
- [15] 步朝霞. 《千万别丢下我》: 关于生与死的启示[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1).
- [16] Gabriele Griffin. Science and the Cultural Imagery: The Case of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J]. *Textual Practice*, 2009(4).
- [17] 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Kazuo Ishiguro’s Traumatic Aesthetics in *Never Let Me Go*

Wang Shunla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Changzhou 213022, China)

Abstract: As a famous novelist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Kazuo Ishiguro shows much concern for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 and tragic fate of humans. *Never Let Me Go*, a science fiction with a deep realistic significance, in which Kazuo Ishiguro has depicted imaginatively the complex emotions expressed by the cloned community living in the modern society when they are faced with life and responsibility. Their life experiences, as a mirror reflecting human survivals in today’s world, reveal the crisis and anxiety caus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awing upon neo-slave narrative, blank narrative and “bystander effect”, Ishiguro thoroughly demonstrates the traumatic aesthetics integrating trauma, solemnity and aesthetic with his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invisible, unspeakable and helpless spiritual trauma suffered by the clones.

Keywords: Kazuo Ishiguro; *Never Let Me Go*; traumatic aesthetics

[责任编辑:孟西]